

第一章

青 少 年 时 代

第一节 秀才世家

孙越崎 原名孙毓麒 曾用名孙世葵,1893 年 10 月 16 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平江乡同康村一个秀才的家庭。^①

绍兴位于浙江东北部 地处杭州湾钱塘江的南岸 京 波 绍 (兴 平原西部 会稽山的北麓 既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 又是美丽富饶的泽国水乡。

春秋时期 绍兴为越国都城 称“越地”。秦汉时置山阴县 东汉为会稽郡。唐代并置会稽、山阴两县。宋及明、清均为绍兴府治。民国元年(1912 年)废府改县 把山阴、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

绍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曾产生过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艺术家、革命家等。春秋时期 这里曾是越王勾践“10 年生聚,10 年教训”之地;晋代杰出书法家和文学家王羲之曾在这里留下“山阴道上行 如在镜中游”的名句。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贺知章(659—744 年),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 年),明代杰出的书画家和诗人徐渭(1521—1593 年)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 年),近代杰出的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 年)、思想家鲁迅(1881—1936 年)、教育家蔡元培(1868—

吴京:《越过崎岖路,走向康庄道——记著名矿业专家孙越崎》载《人物》1983 年第 5 期 第 13 页。

1940年)“和平老人”邵力子(1882—1967年)的故乡都在绍兴。他们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孙越崎的祖父孙纯和系五世单传。据孙越崎回忆，我的高祖只生一子，曾祖朝珩只生祖父纯和一人。祖父生父亲延昌和叔父延渭二人。……上述朝、纯、延、世都是家谱上的排辈，不按照排辈取名，死后进不了祠堂，这是那时交通不发达的规矩。我的祖父终日沉默寡言，思想比较保守，他有点文化，但仅能记帐，不会写信。在我的记忆中，祖父一天到晚都在记帐。他很固执，只让我上了一段时间的私塾，学了一点“四书五经”就不让我读书了。他总认为，书读多了就会离开家乡，他希望我守在家里继承家业。当时我们家在同康村算得上殷实之家，祖父有很大一片竹山。我的祖父于1910年10月去世。

孙纯和生有两子，长子孙延昌，字燕堂，又名孙绳武，即孙越崎的父亲。次子孙毓麟，字英坡，小长子4岁。据孙越崎回忆，由于山上竹林的纠纷，官司输了，祖父下决心让父亲读书。先办私塾，请老师教父亲“四书五经”，然后另请学问比较高的老师教父亲写文章。我的父亲年轻时曾考中过秀才，思想比较先进，人也很开明，村子里有什么事情都找他。有一次不知什么问题，又有一位本家把他们已死的父亲的棺材抬到我家的土地上，说这块地是他们的。我父亲进绍兴城里向会稽县诉讼，官司打赢了。这个本家把棺材抬走了，总算出了一口气，祖父高兴了。我父亲20岁时同山阴县方泉村的方氏结婚。我的母亲生下次子仅一个月就去世了。戊戌变法前后，我父亲经当时在北京生活的一个远房亲戚介绍，千里迢迢赶到地广人稀的黑龙江谋事，先后任过省府缮写员、呼玛县县长、中东铁路特别行政长官秘书等职。

孙越崎还有一侄儿孙孚凌，生于1921年，1945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后任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课员、专员，南京淮南煤矿矿路公司下关煤厂课员。1949年后任北京市福

兴面粉厂经理、厂长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服务局局长，北京市外贸局副局长 北京市青联副主席 全国青联副秘书长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① 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第二节 童年时代

孙毓麒的童年是在他的家乡——绍兴县同康村度过的。同康村位于绍兴县城西南约 30 里处的会稽山下 四周环山 山林总面积 2 600 余亩，毛竹和淡竹资源冠于越中，附近有一铜矿。同康村分上塍、中塍、下塍三个小村 每个小村相距不到一华里 但为山脉隔绝。孙毓麒的家在同康村的上塍。据孙越崎回忆：我的家在上塍的一个四合院，院内人家都姓孙，谁也不知道这个院子是什么时候建设的。院子四周都是山和古老坟墓及竹林，没有一亩水稻田。做饭、泡茶、饮水、洗菜及洗衣物都用泉水。

孙毓麒出生之时，中华民族正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点上，山外的世界正在剧烈地动荡。孙毓麒出世后仅 9 个月 即 1894 年 7 月，日本悍然出兵中国，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历时 8 个月的战争中，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的中国竟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同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并发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呼声。

1895 年 4 月 正当孙毓麒蹒跚学步时 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正在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条约每一款都由日方提出，每一款都令人触目惊心：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① 绍兴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编：《奉献在京华》第 21 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予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等等。在此之前，中国已被迫签订了 10 几个充满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香港、澳门已分别被英国和葡萄牙霸占，北方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给了沙皇俄国；通商口岸增设了一批又一批，军事赔款赔偿了一次又一次。

1901 年 9 月，孙毓麒将满 8 岁之时，李鸿章等人与八国公使在《辛丑条约》上签字画押。《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 45 000 万两，分 39 年还清，年息 4 厘，本息合计 98 000 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在北京划定东交民巷为使馆区；拆毁大沽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天津、山海关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控制清政府，中国完全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孙毓麒就降临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一个错综复杂的新和旧在急遽斗争中交替的时代，一个需要造就一批民族精英，率领民众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时代。

外面的世界风云激荡，孙毓麒的家庭也连遭厄运。1897 年，孙毓麒年仅 4 岁，他的母亲因病辞世。不久，孙的父亲续弦，后妻章氏。此人精明能干，快人快语，但对孙毓麒缺乏感情。随后，孙毓麒的生父和继母双双到了北京，住在崇文门外草场胡同 2 号一个时任候补道尹的远房亲戚家，接着又经亲戚介绍到了东北边陲的黑龙江。孙毓麒就留在绍兴同康村跟着祖父、祖母生活。

据孙毓麒回忆，他的祖母杨氏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特别疼爱自己的孙子。吃饭时遇到较硬的食物，祖母经常先把食物嚼碎后再放入孙子的口中。在宁静秀丽、闭塞偏僻的同康村，孙毓麒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童年时代的孙毓麒整天在山坡上奔跑，在竹林间嬉闹，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两个时代交叉点上，对山外世界的风风雨雨也没有觉察。

第三节 求知之路

孙毓麒的童年是在孤寂而平淡的生活中度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 孙毓麒进了家乡附近一家私塾。在那里 他读了《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等。虽然当时的教授方法是让学生死记硬背 先生不作讲解 但孙毓麒喜欢读书 尤其喜欢大声朗读。在私塾里,孙毓麒表现出爱演说的天赋,特别是他非凡的记忆力,使他受益终生。

正当孙毓麒如饥似渴地求学时 他保守的祖父出面干涉了。祖父认为,孙子读书多了势必会远离家乡,他希望孙子在他身边,继承家业。万般无奈,孙毓麒只好中途辍学,回到家里帮他爷爷和叔叔看管竹林。这一时期 孙毓麒无论春夏秋冬 每日早出晚归 在山上看护竹林。据他回忆 在他看护的邱康山(山名)止有一间小屋,用砖头搭成小灶。“米是自己带去的 山里有泉水 用竹枝、树枝等自己烧饭自己吃,下雨时穿棕帽、棕衣以避雨。不论晴雨 腰间缚一竹皮编的小筐 内放一把砍刀 可以砍东西 脚穿草鞋 肩上背一长把的锄刀 可以掘笋 弄点香菇等 自做自吃 自得其乐。回家时 总要弄到一大捆残干的树枝、竹枝,捆成一大团,用锄头把子插在干枝团中 到家放在灶边 婶婶最喜欢 可以烧开水泡茶。天雨或潮湿时 把草鞋挂在锄头的长把上 赤足走路。”此时的孙毓麒已经粗通文墨,艰苦的体力劳动并没有遏制他旺盛的求知欲望。他经常从家偷油夜读,看着看着,便忘了一切。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左氏春秋》等书。其中“欲速则不达”、“用人唯贤”、“内举不避亲 外举不避仇”等警世恒言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08年10月 孙毓麒的祖父去世 他的父亲从黑龙江赶回奔丧。丧事处理后,孙毓麒要求出去读书。他的父亲与管家的二叔经过商量,决定把孙毓麒送到绍兴城里的简易师范学校继续读书。不

久，孙毓麒考入了绍兴简易师范学校。随后，17 岁的孙毓麒挑着简单的行李和书籍，离开了同康村，前往 30 多里外的绍兴城，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绍兴简易师范学校，现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当时是一所私立学校，是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位绍兴籍姓卢的股东出资兴办的，相当于高小，学制仅两年。这里的一切都使孙毓麒感到格外新鲜：他第一次看到了计时的钟表，第一次听说有礼拜天，……他深切地感受到家乡是多么的闭塞和孤陋寡闻。这无疑引起了他的遐思：绍兴城尚且与同康村有天壤之别，那么，省城将会是怎样？上海将会是怎样？外国将会是怎样？

第一年，孙毓麒学习的课程主要有语文、算术、体操、风琴、唱歌等。语文主要是读《东来博议》。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孙毓麒由于不适应，名列全班倒数第二名；第二学期孙毓麒发奋图强，嗜书如命，在期末考试中成绩优异，排在全班第一名。老师在他的作文《乌罗与乔松》后写了如下评语：“才大气大，文亦足以举之。孙郎的是不凡，孙郎希勉之。”这简短的评语给孙毓麒以莫大的鼓励，令他终生难忘，成为他日后成长的一股与日俱增的驱动力。

孙毓麒在绍兴简易师范学校读书之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这一时期，各种规模的反清秘密起义此伏彼起，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呼声日渐高亢。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影响日益扩大。这一时期的浙江，是全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比较活跃的省份之一。1907 年，鉴湖女侠秋瑾在绍兴主持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校，并以学校为据点，发展光复会会员，联络会党，培养军事骨干，筹划“光复军”起义。这一时期，大通学校成为光复会在中国的大本营和领导中心。起义失败后，秋瑾成为名扬千古的中国近代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而献身的第一个女英雄。她的事迹在绍兴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孙

毓麒的叔叔孙翼庭与秋瑾很熟悉，曾在大通学校学习，学习期间不但学到了很多新知识，还接受了民主救国的新思想。秋瑾被杀后，他曾跑到亲戚家隐蔽约一年时间。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人民反清的情绪愈演愈烈。这一刻，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的消息震动神州大地，各省进步力量纷纷响应。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王金发、蒋介石等人所率上海敢死队的支援下发动起义，攻下抚署，省城杭州宣告光复。11月10日，王金发率部抵达绍兴，组建绍兴军政分府，自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消息传来，孙毓麒激动异常。此时他已被同学们选举为班长。在他的带领下，同学们纷纷剪掉辫子，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

第二年，孙毓麒以优异的成绩从绍兴简易师范学校毕业。这年10月，他在家乡与相邻的诸暨县一个殷实家庭的姑娘葛采湘结婚。婚后，孙毓麒回到绍兴县城，先后在绍兴西门口和城内南大街（距简易师范学校不远）两所小学各担任了半年义务教师。此时社会风气已经大开。但是，国家和民族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带着疑惑和迷惘，带着求知的渴望，孙毓麒走上了新的探索之路。

辛亥革命后，中国掀起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热潮，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地方教育等迅速发展。外面精彩的世界终于吸引年轻的孙毓麒走出了家乡。

第二章

复旦—北洋—北大

第一节 改名立志

1913 年 孙毓麒求学到了上海。

辛亥革命后的上海经过欧风美雨的浸润、中西文化的冲激和经济竞争的磨炼，已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这一时期，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太平洋西岸的这个城市。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上海工业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交通最便利，信息最灵通。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已在上海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新式教育方兴未艾。孙毓麒先考取了震旦学院，随后又考取了复旦公学。经过一番比较，孙毓麒选择了复旦公学（即现在的上海复旦大学）。

复旦公学的前身是 1902 年马相伯^①创办的震旦学院。校舍借用天主教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当时马相伯聘请了一些法国传教士来校任教。1905 年因与法国教会发生冲突，师生相率离开震旦，另

马相伯（1840—1939 年）江苏丹阳人，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天主教徒，1870 年获神学博士学位，经教会授职为神甫，从事传教、教学和翻译工作。后充当李鸿章的幕僚，曾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与其弟马建忠合著《马氏文通》。1902 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 年另创复旦公学，任校长。清末曾参加立宪派组织政闻社。辛亥革命后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等职。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组织，曾担任国民政府委员。1939 年 11 月死于越南谅山。

组新校。马相伯根据《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将新校定名为复旦公学，既表达了对光明的追求，也寓有恢复震旦的爱国意向。1905年8月，复旦公学正式成立。^①

复旦公学录取新生均经过严格的考核。孙毓麒进校时，校长是李登辉，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于右任、王宠惠等人为校董，王宠惠为董事长。学校已迁到上海徐家汇李公祠。当时的英文由李登辉亲自讲授，国文教师由蒋梅笙、邵力子担任，同时还开设有德文、物理、化学、数学等课程。据孙毓麒回忆：“邵力子先生，浙江绍兴人，是我的同乡，也是我1913年在上海复旦公学上学时的国文老师。他是同盟会会员，与于右任先生交谊很深。二人都是复旦公学的董事。……他在复旦公学教书时，宣传革命思想，对学生出国文课的作文题时，常常寓意反对袁世凯，给学生灌输革命的道理。”^②

根据《复旦公学章程》规定，新生入校后，除本国语文、历史、地理及伦理学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外国课本，运用外语教学。其理由是：（1）外国历史、地理上的人名、地名等，如果译成汉文，佶屈聱牙，不便记忆；（2）外国科学、哲学、法律等名词，一时势难遍译，不如径用西文，较为简便；（3）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者，必先知彼。先知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4）西籍浩繁，非移译所能尽收；况泰西科学，时有新知，不识其文，未由取益，必至彼已累变，我尚懵然”。^③由此可见，当时的复旦公学非常重视外语教学。孙毓麒正是在此期间刻苦学习外语，为日后赴美国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外语，复旦公学也很重视国语教学。校方不仅在录取新生

① 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一卷）第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孙越崎：《邵力子先生和我的关系》载《和平老人邵力子》第16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赵少荃：《复旦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载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解放前上海的学校》第42—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时“皆取文笔业已通达者”，而且在学生进校后仍要求每人每月交国文作文 1—2 篇。学校每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都举行演说会，校长、教员、学生均可以登台演讲。据当时在复旦公学学习的朱仲华回忆：“1914 年起，校内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各班级都组织演讲会、辩论会、音乐会、息游社、乐群社等团体组织。1917 年（应是 1916 年——著者注）上海发起第一次六大学演说竞赛会（南洋、震旦、沪江、圣约翰、大同、复旦）我校同学孙越崎得演说冠军。^①关于这次演讲比赛，据孙毓麒回忆：“这次演讲比赛的参赛选手来自东南地区的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的学校，每校选拔两名选手，共约 90 人。记得每天晚上比赛，地点设在上海，采用分组淘汰制。仅剩 9 名选手时仍有我。决赛安排在上海青年会举行，每人限讲演 10 分钟。我讲演的题目是《自鸣钟之声音》，开头就讲 嘀 嗒 嘀 嗒……这是什么声音？这是自鸣钟之声音。我泱泱中国可能将被东瀛日本亡国灭种，我辈学生要抓紧时间，勤奋苦学，报效祖国，以挽狂澜于既倒。……。这次演讲比赛我因绍兴口音较重，结果屈居亚军。”

孙毓麒在复旦公学读书期间，正是世界风雨激荡、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主要帝国主义都卷了进去，无暇东顾。日本企图乘机独占中国。它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武装占领了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驻华公使又向袁世凯面递意在灭亡中国的“21 条”要求。对于这样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袁世凯除提出第 5 款“容日后协商”外，其余条款全部接受，并与日本达成默契。袁世凯一旦称帝，日本将率先承认并予支持。“21 条”的谈判与签订，在全中国激

朱仲华：《忆母校复旦大学》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 29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起了强烈的愤慨和反抗。上海人民在 1915 年 3 月间得知日本提出“21 条”的消息后 首先组织“国民对日同志会”召开群众大会 决议拒用日货。孙毓麒忧心如焚 他“鉴于有亡国之忧 前途崎岖 因改名越崎，音同而字不同，取意心存救国，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① 从此，孙毓麒改名为孙越崎。

1916 年 7 月 孙越崎从复旦公学毕业。次年 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

第二节 “五四” 闯将

1916 年 9 月，孙越崎考入位于渤海之滨的天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

北洋大学创建于 1895 年 10 月 2 日 当时的校名为天津北洋大学堂，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大学之一。北洋大学堂创办之始，提倡“西学体用”以美式大学为办学模式。当时的北洋大学堂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学制各为 4 年。头等学堂设 4 个科（系）：工程（土建）、矿冶、机械、法律。课程以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法律为主课。除汉文课和其他少量课程由中国教习担任外，其余课程均聘外国教习担任。教科书多使用外文原版 用外语直接授课 并开设实习课。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方法上 均以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大学为标准。据孙越崎回忆：北洋大学的“招生考试非常严格，常常在数百名考生中才录取一名新生。入学后，两门功课不及格就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退学。一个班开始三四十名学生，到毕业时往往只剩下十余

《孙越崎传略》载《复旦大学志》（第一卷）第 490 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人”。^①当时北洋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免试直接进入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大学攻读研究生。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外交家王宠惠、王正廷，革命先驱张太雷等均是北洋学子。

据孙越崎回忆 当时北洋大学的“教授全是美国人 只有物理、化学实验室和野外测量的助教是中国人，校长、总务长也是中国人 但他们只管行政 不管教务。功课很多，考试频繁 学生只知读书 不问政治 是一个守旧的学校。”^②孙越崎初进北洋大学学的是文科，不久接到正在黑龙江开金矿的父亲来信。在信中，父亲对他学文科颇为不满“……我都已经不做‘高级流氓’了 所以希望你今后也不要做‘高级流氓’。既然大學里有采矿系 你还是改学采矿技术为好……”。父亲信中所说的不做“高级流氓”就是指他已辞去呼玛县县长职务。他把进官场称作当“高级流氓”足见他鄙视官场。这封信对孙越崎震动很大，对他选择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越崎遵从父命，1917年暑假没有回家 在校补习物理、化学和数学，一举考入北洋大学矿冶系，成为该系本科十班的学生。从此，孙越崎憧憬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由于他成绩优异，又显示出非凡的组织能力，不久他就当选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③同时他还担任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演说辩论会会长。^④

1919年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很快传到天津，立即激起天津广大青年学生的无比愤怒。当时，孙越崎就读

孙越崎：《我在“北洋”》，载《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7日第7版。

孙越崎：《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载《孙越崎文选》第1页 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孙越崎传略》，载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一卷）第49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孙越崎：《回忆在北洋大学的读书生活》，载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友总会编《校友通讯》，1985年第2期，第54页。

的北洋大学是天津的最高学府。5月6日北洋大学学生会以北洋大学全体学生的名义，致电北京大学转各学校钧鉴：惩贼有勇，极表赞同，以后共同进行。同日致电北京大总统和国务院：北京学生举动情殷爱国所拘19人恳请释放。^①这一天以孙越崎为会长的北洋大学学生会还特意致电上海南北和议代表唐少川、朱桂莘等人，乞请他们电请政府释放被拘学生。^②随后他们又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为谋世界悠久之和平，贯彻公理战胜之精神，青岛、胶济应直接返还我国21条条约亦当然废除。务望诸公力持到底，不获所愿，不签和约。全国人民实同此意。^③

与此同时，天津市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9人秘密集会讨论声援的办法。记得到会的有：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贵州人）南开中学的马骏（吉林人）天津美术专科学校的沙主埏（天津人）北洋大学由我（即孙越崎——著者注）代表出席。大约集会讨论了两三次，最后一次会上决定全市大中学校第二天一律罢课，表示声援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当时会场上气氛非常严肃紧张，在表决时要一个一个站起来表态，大学代表在前，中学代表在后。那时我想，虽然北洋大学存在着保守势力，罢课可能有一定困难，但广大同学是爱国的，为争取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拒签辱国条约，他们一定会冲破一切阻力支持罢课的。因此我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我代表我校全体同学从明天起，一定罢课。’接着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第二个站起来表示同意”。^④会后，孙越崎立即赶回北洋大学，一方面发动同学们尤其是应届毕业生次日罢课，一方面向校长赵天麟作了汇报，争取他的支持。随后孙越崎摇铃召开全校学生

见天津《益世报》1919年5月6日。

见天津《大公报》1919年5月6日。

见天津《益世报》1919年5月7日。

孙越崎：《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载《孙越崎文选》第1—2页，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大会。会上，我详细报告了各校代表开会的经过情况，说明了第二天起天津市大、中学校一律罢课的决定，并说我已代表全校同学表示同意，请大家审议。这时同学们情绪激昂，一致拥护次日罢课。^①关于这一天的活动，当时在北洋大学采矿系学习、并是孙越崎同班同学的谌伊璠（小岑）也有一段回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自5月19日起罢课，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收回山东权益，并派代表到天津来要求响应。天津学生联合会接连举行了三次紧急会议，讨论罢课问题。北洋大学均派代表参加。5月22日下午的会议特别显得紧张。学联合会表决罢课是用一个一个代表站起来发言表示态度的方式。当时除私立法政学校代表表示不敢负责外，其余十几个学校代表都愿意负责回校向全体同学传达，举行罢课。北洋大学代表回到学校后，首先征求了毕业班同学的意见，然后在化学教室开会。全体同学对当时以徐世昌为首的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一致通过了罢课的决议。”^②据孙越崎回忆：“学生会是北洋大学的正式组织，我认为应该告诉校长赵天麟。我和他日常就学生会的工作联系较多，关系很好。这次我告诉他，明天全体学生罢课，声援‘五四’，他没作任何表示。据同学告诉我，当同学们集会对罢课与否作表决时，赵曾在后面听，照当时的政治情况和北洋现状，校长不管教务，对全体罢课不予阻挡，就算难得，赵天麟不是太顽固的人。”^③

5月23日，以北洋大学为首的天津15所中等以上学校约一

孙越崎：《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载《孙越崎文选》第3页，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谌小岑：《五四运动中的天津北洋大学》，载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编辑组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第7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孙越崎：《回忆在北洋大学的读书生活》，载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友总会编《校友通讯》，1985年第2期，第54页。

万多学生全体罢课。25 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 选出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 郭隆真、张若名、邓颖超为评议委员。邓颖超还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此后，热血沸腾的天津男女学生分别组织讲演队，慷慨激昂地四处宣传，沉痛诉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各界奋起救国，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时 21 岁的周恩来特意从日本赶回天津，参加并领导了学生运动。

进入 6 月，运动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展。6 月 3 日 北京军警大规模逮捕学生。当天晚上，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抵津报告情形。6 月 5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中学操场召开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北洋大学的队伍走在最前面。游行队伍还没有走出操场，就和前来阻拦的武装军警发生了冲突。警方只允许学生派代表去见省长。天津学生联合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推荐“北洋法政学校联合会讲演团总团长易守康、南开中学联合会副会长马骏、新学书院联合会交际科长卢致得（应是谌志笃——著者注）北洋大学联合会庶务员孙毓麟 麒之误——著者注）、成美中学联合会讲演员沙主培均赴省公署谒见曹省长，要求关于提出条件而安人民之惶恐，以免学生留难云”。^① 关于天津学生联合会推荐的五位代表，1919 年 6 月 6 日的天津《益世报》也有报道：“此五代表为易君守康、孙君毓麟、谌君志笃、沙君祖培、马君骏。”

为了阻止学生上街游行，6 月 5 日下午 天津警察厅厅长张汝桐下令到处张贴布告，严禁学生游行讲演。布告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照得本日各校学生在南开地方，聚集千余人，任意游说 并拟结队游行。本厅以其逾越轨道 妨害治安 当

见天津《大公报》1919 年 6 月 7 日。

即会商教育厅 禀承省长 派拨官警前往勒令解散。查禁群众演说以及散布传单，并各种印刷品，均早奉大总统明令禁止，合再剴切布告。嗣后如再有游行演说散布传单及各种图书情事 无论何人 本厅一律禁止。其不服制止者 即依法逮办 决不宽容。此布。

孙越崎等五名学生代表在上述布告已张贴后 无所畏惧 大义凛然地走进直隶省长公署，与省长曹锐举行谈判。谈判开始后，孙越崎等人首先代表广大学生提出三点要求：“第一 仍愿继续讲演，请省长莫加干涉 第二 请省长拍电中央 速释被捕之学生 并须将青岛争回，将密约取消；第三，请准开公民大会，并请由省长定期。”^② 曹锐不同意召开公民大会 要求学生第二天就恢复上课 如欲讲演 可于星期日出来 并威胁说：“倘不上课 鄙人无可如何 亦惟有取严厉办法而已。”^③

正当双方互不相让、相持不下之时，老奸巨滑的曹锐听出五名学生代表中最年轻的沙主培是天津人，突然用手在桌子上猛拍一下，把茶杯都震碎了，茶水四溢。坐在一边的直隶省教育厅长王章祐慌忙站起来 连声说：“请省长息怒 请省长息怒。”曹锐指着沙主培说：“他们三个 应是四个——著者注 都是外省人 你是本地人，是我的同乡，咱们的祖宗坟墓和财产庐舍都在这里，万一闹出事来，日本海军一开炮 他们三个 应是四个——著者注）走了事，我们本地人都完了，你不应跟着他们一起闹。”^④ 孙越崎等人毫不畏惧 针锋相对地回答：“你这套戏法对你的奴才用得着 对我们可

马惠卿：《五四运动在天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 55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天津《益世报》1919 年 6 月 6 日。

天津《益世报》1919 年 6 月 6 日。

孙越崎：《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载《孙越崎文选》第 5 页 团结出版社 1992 年版。

用不上。你不拍电报，我们决不复课。北京学生一天不释放，我们一天不复课。天津地区闹出事来，由你省长负责。”^①

与此同时，天津女子师范的上百名学生听说学生代表正在与省长谈判，立即赶到省长公署门口声援。被警察围在南开中学操场的游行队伍也突破重围，浩浩荡荡地游行到省长公署门口，并要求与学生代表见面。

孙越崎等五位代表离开省长公署后，在天津工业学校操场向各校学生报告了与曹锐谈判的情形。广大学生对曹锐的态度十分气愤，纷纷表示决不复课，决心继续斗争下去。

次日凌晨，即有 30 名武装巡警监视北洋大学。6 月 8 日早晨，天津警察厅突然派骑兵 300 名包围了仍在罢课的北洋大学，禁止学生出入。不久，省政府又下令各校提前放假、停止考试，以破坏罢课。不少同学看到此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已被免职，中国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已拒绝签字，运动已进行了两个多月，斗争情绪开始松懈。暑假期间，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被迫辞职，曹锐任命冯熙运接任校长。冯熙运上任之时正是北洋大学新学年开学之际。由于上学期末学生参加“五四”运动而没有考试，校方在开学后即通知全体学生一律补考。当时土木系的学生已去北戴河进行测量实习，外籍教授要这些学生白天实习，晚上考试。此举引起学生的反感，全体不上他开设的课，并要求校方辞退这位外籍教授。土木系学生的行动得到全校学生的支持，因为补考不及格是要降级的。为了压制学生补考，冯熙运粗暴地停止对学生供电和开伙，要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学生写悔过书，否则不开学。孙越崎断然拒绝悔过。于是，他被校方开除了学籍。据孙越崎回忆，当时“我们矿冶一年级班不到 30 人，写悔过书的只有两个，一个因爱人受公婆气，他要被

孙越崎：《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载《孙越崎文选》第 5 页，团结出版社 1992 年版。